

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寻找)所赞同。”<sup>[6](P586—687)</sup>从以上引文字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确实具有超阶级的特征,恩格斯说它“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是有其道理的。

最后,恩格斯在否定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又对自己所坚持的“成熟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了画龙点睛式的论述,这就是93个中文字后面的那句话:“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这句话可以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精髓。别指望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一起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随着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从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理论转变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科学的理论,而且自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以后,他们就一直坚持这样的理论。实际上,在恩格斯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不到3年,即在1847年,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超越了那种超阶级的观点,把共产主义表述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sup>[7](P230)</sup>;次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更是这样说道:“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视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sup>[1](P66)</sup>。那些提出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是对《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了否定的人,完全不顾起码的历史事实。其实,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美国版附录”的随后几年,《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这三大名篇在欧洲都曾一再重版,恩格斯为它们的若干个再版本都作过序。这些序言同样清楚地告诉我们,恩格斯在晚年非但没有放弃这三大名篇的共产主义学说,还一再声明坚持这一学说。比如前边我们已引述过的恩格斯为《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恩格斯一方面明确地把《宣言》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又重申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所下的结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sup>[1](P14)</sup>这是恩格斯在1888年写下的文字,强调

的是《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怎么可以闭眼不看这一事实,竟然说在1886年恩格斯已放弃了《宣言》的基本理论了?又如,1891年柏林的前进报社要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特地写了《导言》,其中有这样一番话:“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sup>[8](P279)</sup>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在1891年重申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此,说马克思恩格斯于1886年就已放弃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岂不是无稽之谈?再如,1891年,恩格斯主持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并为这单行本写了序言。恩格斯把《哥达纲领批判》视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称“如果我还延时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sup>[8](P105)</sup>。1891年10月24日,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也对《哥达纲领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表示“感到满意”<sup>[9](P180)</sup>。如果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已放弃了《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理论,为什么还会在1891年出版《哥达纲领批判》的单行本并为之作序?又岂能在1891年为该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作用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说来说去,有些人之所以如此不顾文本和历史的真实大肆宣扬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中的这93个中文字,就是为了说明恩格斯在晚年已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进一步驳斥这种观点的荒谬性,我们不妨再引证一个历史事实。1890年,恩格斯70岁之际,为了表达对这位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敬意,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学派和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向恩格斯致以生日的祝贺。恩格斯是这样回答这些祝贺信的:“请你们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将献给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sup>[8](P101)</sup>，“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sup>[8](P309—310)</sup>。这是70岁的恩格斯所发出的心声,从中丝毫看不出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痕迹,我们所看到的,是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

事情十分清楚,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中是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上否定早期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那些抓住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美国版附录”中的93个中文字大做文章的人完全颠倒了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就是说,明明是恩格斯用三大名篇所阐述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否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那93个中文字为主要内容的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而他们却偏要说成是恩格斯用那93个中文字为主要内容的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学说否定了三大名篇所阐述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 三

1895年1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出版社经理查·费舍写信给恩格斯,请求他同意该出版社把马克思1850年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的一组文章印成小册子出版,同时请求恩格斯为这个单行本写一篇导言。恩格斯表示同意,并在1895年3月6日把题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的文章撰写完毕。《导言》写完后不到5个月,恩格斯就去世了。《导言》堪称恩格斯一生所写的最后一篇重要政治论文。在《导言》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词句:“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等等。伯恩斯坦当年就曾以《导言》中的这些话为依据,说恩格斯在晚年已着手“修正”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国内一些人也以《导言》中的这些话为依据,论证恩格斯晚年已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民主社会主义阶段,论证恩格斯在晚年实际上已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这里,我们就来认真研读一下恩格斯的《导言》,看看晚年恩格斯是不是已从共产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

必须首先说明的是,恩格斯在1895年3月6日至8月5日逝世这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他本人曾数次强烈地对有人歪曲他的《导言》的基本思想,把他说成力主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这一点表示了不满。而当时有些人之所以利用《导言》把恩格斯说成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说来说去只是因为恩格斯在《导言》里对工人阶级争取和利用普选权给予了肯定。恩格斯确曾赞赏并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认为德国社

会民主党“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sup>[8](P601)</sup>,同时他也非常赞同“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所说的“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sup>[8](P602)</sup>。恩格斯还具体列举了选举权对工人阶级的种种好处,并基于这些好处得出结论说:“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sup>[8](P603)</sup>问题在于,根据恩格斯所有这些肯定利用普选权的话语,我们能否就可以得出恩格斯已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结论来?对此,我们必须指出三点:

第一,利用普选权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持有的一个观点,而不是到了晚年才提出来的。如果说因为肯定了利用普选权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正如恩格斯在《导言》中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sup>[8](P602)</sup>这就是说,恩格斯自己也承认,1848年的《宣言》中就已有了利用普选权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不仅在《宣言》中肯定对普选权的利用,而且在其它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如马克思1850年就提出:“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sup>[10](P264)</sup>到了晚年,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对利用普选权有了更高的期待,这也是事实。除了在《导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对利用普选权的赞赏外,他在其它场合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如1893年9月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中,恩格斯就讲道:“现在你们正在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它是无产阶级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选权是检验党的影响、计算党的力量的唯一手段。”<sup>[8](P481)</sup>

第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利用普选权的肯定,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迷恋利用普选权的批评,而且他们在肯定利用普选权时,处处强调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制度局限”和“阶级局限”。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贯穿于他们一生的著作之中,对西方民主

制度的揭露构成了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提出西方的议会制不过是“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sup>[2](P57)</sup>,这是马克思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一个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显然,这一表述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认知主要是负面的。恩格斯对于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标尺”论,他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sup>[4](P173—174)</sup>。把普选制作为用以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说明恩格斯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对工人阶级的真正意义并不持乐观态度。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曾明确地说议会民主制度已经没有“制度局限”和“阶级局限”,从来没有要工人阶级完全认同这一制度。恩格斯在逝世前一年给保·拉法格写过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所怀有的戒心。他这样写道:“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sup>[4](P734—735)</sup>。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指出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是由其内容决定的,按其内容来分析,它毫无疑问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对它抱任何幻想,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它来完成。我们还可再看一看恩格斯在《导言》中是如何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的伎俩进行分析的。他揭露说,正当无产阶级政党在积极利用议会民主制度之时,控制议会的资产阶级政要却在“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sup>[8](P611)</sup>。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当议会民主制度变得对无产阶级有利之时,资产阶级马上会露出真面目,他们会破坏现成的法律,甚至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当然,在恩格斯看来,“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完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sup>[8](P611)</sup>。恩格斯这里是在正告资产阶级,但同时也是在提醒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要随时会破坏现成的法律,所

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随时准备“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用其它的任何手段对付资产阶级。犹有可言者,《导言》在讲到进行合法斗争时,往往会使用“现在”这个限制词,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只是在“现在”这种形势下才有可行性。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要求恩格斯把“现在”这个限制词去掉,恩格斯知道这个限制词分量很重,删去它就意味着把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变成一个普适的战略,于是坚决予以拒绝。他明确地对这些领导人说:“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sup>[11](P401)</sup>恩格斯似乎早已预见到,把“现在”这个限制词去掉,有人就会因此而把他说成是一个力主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而会使自己“蒙受耻辱”。现在的问题是,尽管他没有把这个词删掉,却还是有人要让他“蒙受耻辱”。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利用普选权的同时,从来没有否定过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他们始终坚持合法的改良斗争和暴力革命“两手论”而不是“一手论”。一些学者通过歪曲地引用恩格斯的有关言语,认为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暴力革命持反对态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所引的是恩格斯下述一段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sup>[8](P595)</sup>有引者在“1848年的斗争方法”后括注说:“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这样一来,恩格斯在这里似乎就把暴力革命作为一种“已经陈旧”的方法否定掉了。问题在于,恩格斯在此作为“已经陈旧”的方法加以否定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指的就是“《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吗?只要仔细地阅读一下原文就可知道,这是“引者”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段强加给恩格斯的。那么,被恩格斯视为“已经陈旧”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恩格斯自己已讲得非常清楚,指的是“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在维也纳”、“1849年在德勒斯顿”的那种方法<sup>[8](P604)</sup>。恩格斯认为,由于“斗争的条件”“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